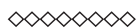


# 目 录



## 文学翻译史研究

教育小说的本土再造：郑晓沧《小妇人》汉译研究

金 怡 蒋 硕 / 3

翻译与权力的多维关系

——以聂华苓夫妇译毛泽东诗词为例

戴 薇 / 17

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译本底本变动研究

巫元琼 / 30

美国作家多萝西·帕克在抗战大后方的译介

蓝 岚 / 46

## 区域翻译史研究

跨文化·多领域·民族性：近现代贵州翻译家群体考论

周 杰 陈丽君 / 63

## 译史纵横

清朝前期中央对地方的翻译治理与地域整合探究

姜广胜 / 83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知识冲突与翻译策略

伊纪昌 / 98

论“大学”一词的产生及在汉字文化圈中的环流

彭程 何祖宁 张佳佳 / 111

回顾与展望：一部《外国音乐文献翻译目录编年（20世纪卷）》的构想

车树昇 / 126

## 名家访谈

翻译中国：时代的使命

——黄友义先生访谈录

迪丽呼玛·依沙克 / 141

## 新书介评

翻译理论与音乐学的跨学科对话：评《翻译理论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应用》

陈鹏宇 / 159

赞助人理论的应用、深化与展望：《文学翻译史上的“漓江现象”——新时期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述评

谭滢 / 169

## 会议综述

“第七届中国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暨新时代翻译史研究与教学师资培  
训研讨会”综述

杨 瑞 / 179

“林纾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嘉仪 / 187

英文摘要 / 193



# 文学翻译史研究



# 教育小说的本土再造：郑晓沧《小妇人》汉译研究<sup>\*</sup>

金 怡 蒋 硕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1)

**摘要:**《小妇人》是 19 世纪美国作家露易莎·梅·奥尔柯特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是探讨西方传统家庭、儿童成长与女性主义等主题的文学经典。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郑晓沧将《小妇人》以“教育小说”之名汉译传入中国，影响了众多教育工作者与普通读者。研究揭示了郑译本对《小妇人》的创造性翻译转化及译本与彼时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刻互动：郑晓沧通过翻译赋予了译本高识别度的教育属性；将西方宗教教育思想转化为中国传统儒学的教育内涵；译本宣扬的教育理念与当时“新教育”的期待视野高度契合，为国人提供了鲜活的教育范本。在此基础上，研究重新评价了郑晓沧作为近现代教育翻译家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教育小说翻译；《小妇人》；郑晓沧

## 0 引言

五四以降，外国文学的译介空前繁荣，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篇章。同时，这也是一个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西方的教育小说作品被广泛翻译和出版，成为当时文学翻译中值得关注的独特领域。这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文学、传统价值与新兴价值之间的复杂交织，更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教育模式，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沈庆会、孔祥立 2012：199）。

《小妇人》(*Little Women*) 是美国作家露易莎·梅·奥尔柯特 (Louisa May Alcott) 的半自传体小说，问世之后引起了英美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自 20 世纪 20 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小妇人》汉译本现已达四十余种<sup>①</sup>。国内学者对于《小妇人》汉译的翻译研究大多聚焦于其作为通俗文学和女性小说的特点（尤美 2022；赵雪

---

<sup>\*</sup> 本文系浙江省外文学会 2025 年专题研究项目“郑晓沧翻译文献整理与研究” (ZWYB2025032) 的阶段性生活成果之一。

晴 2021; 于胜蓝 2021; 赵聪 2019 等), 忽略了其在“教育小说”译介发展中的地位; 研究译本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王之光、王岑卉、刘春英与陈玉立等译本(同上), 民国时期郑晓沧的译介则鲜有纳入研究视野。兼具教育家、翻译家与诗人多重身份的郑晓沧于 1932 年翻译出版《小妇人》, 从此, “一代名著, 始得介绍入于中土, 予国人以亲炙之机会”(孙枋 1937: 44)。该作品的出版立即引起轰动, 几家报刊纷纷称赞其“译笔忠实, 笔笔生动, 字字传神”“雅丽信达”“实为家家、人人, 尤其是女子们的必读之书”(潘建民 2005: 29)。本文将郑译本置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 全面探讨《小妇人》作为教育小说的汉语翻译实践。

### 1 郑晓沧: 地方教育和文学翻译的实践者

郑晓沧(1892—1979), 名宗海, 浙江海宁人, 著名教育家、翻译家。他出生于文学世家, 八岁后, 由于家塾不复存在, 父亲亲自担任他的老师, 每天给他上新课(王承绪、赵端瑛 1993: 276)。可见, 郑晓沧的成就离不开家中耳濡目染的教育氛围和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凭借杰出的课业表现和深厚的英语功底, 郑晓沧从清华大学文科毕业后, 于 1914 年 6 月前往美国留学, 师从教育家杜威<sup>②</sup>, 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教育理念。此后, 他“居美国若干年, 对于彼邦的成语和句调, 也颇留心体会, 又因颇好文学, 于中西文字凡所能通晓的, 遇有优美的意境, 或佳妙的文辞, 每往复流连, 不能自己”(郑晓沧 1932a: 3)。由此看来, 郑晓沧所处这样的特殊时代背景, 古今交错, 一方面根植于传统儒学的土壤, 另一方面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理念。因此, 他兼具鲜明的儒家色彩和西方的君子之风, 博古通今, 在教育、翻译、诗词等多个领域, 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

回国后, 郑晓沧奋斗于江浙一带的高等教育事业。他不仅在综合性大学和高师从事教学与研究, 同时还长期担任浙江一些高校的管理与领导工作(王承绪、赵端瑛 1993: 5)。从 1929 年 8 月起, 郑晓沧任职于国立浙江大学; 1952 年院系调整, 他调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 1962 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1964 年郑晓沧回杭州大学, 任教育学系教授以及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田正平、潘文鸯 2017: 122)。

然而谈及郑晓沧, 金庸曾经说过: “大家对于这位学者熟悉, 恐怕不是由于他在教育科学上的造诣, 而是由于他所译的《小妇人》与《好妻子》。”(查良镛 1946: 27) 郑晓沧的翻译活动贯穿其教育实践生涯, 其翻译作品大致可分

为教育理论类和教育文学类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儿童与教材》(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John Dewey 著)、《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F. G. Bonser 著)、《密勒氏人生教育》( *Education for the Needs of Life*, Irving E. Miller 著) 等教育著作；后者以美国作家奥尔柯特( Louisa May Alcott ) 创作的三部曲译本《小妇人》( *Little Women* )、《好妻子》( *Good Wives* ) 以及《小男儿》( *Little Men* ) 为代表，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小妇人》，不仅当时很受欢迎，而且其影响持续不衰，从发行次数和销量上可窥见一斑。1929年9月首次由杭州的浙江印刷公司出版以来，《小妇人》短短两年内经历了四次重印发行。1944年12月第五版发行之际，该书已有近15,000本的销量( 心沭 1935: 135)。1988年正值奥尔柯特逝世一百周年，浙江教育出版社整理和重新出版了三部曲译本，这既是对奥尔柯特的怀念，也是对郑晓沧的缅怀和对其译作的认可。由此可见，郑译《小妇人》在20世纪的小说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其蕴含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 2 郑译《小妇人》：以“教育小说”之名

自1932年出版以来，郑译《小妇人》被认为“和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是同样有价值的儿童读物”( 朱维之 1941: 302)。民国时期的报刊引介此书为“情文并茂的教育小说”，并表示读者须如研究哲学书一般，耐心咀嚼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教育哲学意味和独特创作精神，而不是用阅读一般普通小说的态度来看待，否则将会辜负其给予读者的启示和教训( 孙枋 1937: 44)。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教育小说”的内涵在当时并没有被严格界定，但有着不同于德国传统语境中“Bildungsroman”的意义指射。“Bildungsroman”一词在中国最先于1943年由冯至翻译为“修养小说”，1949年被替换为“教育小说”，后来逐渐以“成长小说”被人接受，并成为一种文类的代名词( 马新亚 2023: 58)。西方“成长小说”关注主人公精神与自我确认，“内述一人自幼而少而壮而老之思想、感情、见闻、境遇之变迁，而国家社会种种之变迁，即由此一人之所见所感者而代表”( 吴宓 1923: 17)。由此可见，通过情感、思想、见闻以及生活场景的描绘，“成长小说”凸显人的内心世界和自我认知的变化。同时，故事中主人公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可以成为反映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而中国的“教育小说”一词在现代文学语境中早已存在，且更加指向主人公

接受教育而获得发展的客观过程（刘阳河 2024：15）。吴宓认为《教育世界》1903年刊出的《爱美耳莎》（今译《爱弥儿》）、1909年刊出的《馨儿就学记》等“关于学校生活，意在说明教育原理、教授方法而晓示品格修养”的作品皆如此类（吴宓 1923：18）。沿此思路，反观《小妇人》，自1932年的郑译本发布以来，译者和读者皆对故事中蕴含的教育问题格外关注。郑晓沧对于《小妇人》三部曲中蕴含的教育理念尤为认可，认为其是“奥尔珂德女士借以抒写其父亲的教育理想”的产物（郑晓沧 1936：2）。他指出，《小妇人》中体现的种种精神，“是家庭小说中之深具教育的价值者，无怪英美教育家乐以此为青年之读物”（郑晓沧 1932a：3），这也是郑晓沧选择翻译这三部曲的初衷。正如陈衡哲<sup>③</sup>所说，“儿童教育之为救亡的基本”。而郑译《小妇人》所昭示的，正是20世纪所不能废弃的“待人待己，处事接物的庸德庸行”（衡哲 1932：20）。教育家傅任敢认为“《小妇人》的贡献本不在《爱弥尔》和《爱的教育》之下”（傅任敢 1933：957）。《民智月报》指出，对于青年们来说，《小妇人》“是负有教育使命的……确是青年的弃旧恋新，不能安守职务而欲壑难填者的当头棒喝”（孜孜 1936：29）。由此可见，当时学界所讨论的郑译《小妇人》的主题更接近于吴宓所说的我国“教育小说”的内涵范畴，即“说明教育原理、教授方法而晓示品格修养”。

总之，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肩负着“救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背景下，郑晓沧的译作《小妇人》作为一部“教育小说”广为国人所熟知。除郑晓沧细腻的语言风格与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外，小说中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亦成为学界广泛讨论的重点议题。

### 3 郑译《小妇人》道德训诫的中国式转化

《小妇人》原书作者奥尔珂特在故事中向读者宣传教育理念的方式，大体上借助了基督教这一载体。故事中小妇人们的家庭正是美国模范基督徒家庭的真实写照，该书也曾被学者视为女性版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sup>④</sup>（易乐湘 2007：127）。《小妇人》从章节标题、情节内容等多方面借用了《天路历程》中的意象，充满了道德说教意味，暗示在第一章“天路历程”的戏里，马夫人是循循善诱的宣道师，小妇人们扮演的是基督徒的角色，其成长教育经历以及对理想的追寻实则呼应小基督徒的“天路历程”。而郑晓沧在《小妇人》的翻译中，通过引用中国经典名著、融入传统文化意象以及运用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实现了对西方宗

教教育思想向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转变，即在文本语言形式、文化意象与思想体系三个层面，完成了道德训诫的中国式转化，使译文呈现出深刻的儒学教育内涵与独特的本土化特征。具体转化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1 《小妇人》原文与郑译本对照

原文	郑译本
a true guide-book for any pilgrim	长征的良导
guide-book	迷津宝筏
Palace Beautiful	华严宫
He that is down need fear no fall.	位高有悔，安不忘危。
He that is humble ever shall Have God to be his guide.	劳谦之子，天必福之。
And, Lord ! contentment still I crave, Because Thou savest such.	天既降祉，知足不辱。
Fulness to them a burden is, That go on Pilgrimage.	敢道艰贞，如履薄冰。
Here little, and hereafter bliss, Is best from age to age!	志则苦矣，仁域永登。

郑晓沧在诗歌翻译中大量引用中国经典名著，巧妙地实现了文本表达方式的转换。以歌词“He that is down need fear no fall. He that is humble ever shall, Have God to be his guide. Fulness to them a burden is, That go on Pilgrimage...Here little, and hereafter bliss, Is best from age to age”为例，此为佩丝为迎接马先生凯旋而编排的曲子，源自《天路历程》中朝圣者听到的牧童歌曲。原文大意指上帝对教徒的指引作用，并告诫教徒们朝圣之路即为救赎之路，只有通过忏悔和对欲望的抑制，终能达到“极乐”。郑晓沧弱化了“God（主）”“pilgrimage（朝圣）”“bliss（极乐）”等词汇，而是引经据典，将其转化为中国传统诗歌的四字结构。“位高有悔，安不忘危”来源于《周易》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杨天才、张善文 2011：622），教育人们在太平顺达的境遇中要时常提醒自己加以警戒。“劳谦之子”出自《易经·象传》“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同上：153），蕴含勤劳且谦虚之意。“敢道艰贞，如履薄冰”则来自《诗经·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秀梅 2007：130），用以告诫世人审慎度势。“天既降祉，知足不辱”出自《道德经》中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王弼、楼宇烈 2011：125），暗示“知足常乐”的

人生哲学和生活智慧。通过这些经典名句的引用，郑晓沧不仅在文本中重塑了原文的思想内涵，更将原本基督教色彩浓厚的宗教思想转化为儒家道家的伦理道德教化，从而实现了文本表达方式的中国式转化，也试图展现出中国核心经典话语的世界性意义。

再者，郑晓沧通过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实现了对西方文化意象的本土化再造。例如，故事中“a true guidebook for any pilgrim”字面意思为“朝圣指南”，该指南作为四姐妹在面对困惑或挫折时的重要精神寄托，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每当她们陷入困境时，便会翻阅此书，以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指导。显然，郑晓沧在译文中省略了“朝圣”的含义，将其转换为“长征的良导”。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长征”不仅承载着面对困境的含义，更象征着坚忍不拔、顽强奋斗的精神内核。这一转译巧妙地将西方文化中的“朝圣”与中国语境中的“长征”进行对接，彰显出两者在教育内涵上的契合与共通性。此外，原文的“guide-book”被转译为“迷津宝筏”，该词源自佛教经典，指代引导人们摆脱迷茫、走向智慧和真理的途径或方法。“迷津宝筏”不仅传递了“引导”的核心意义，更在文化符号层面上将原文意象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智慧的象征。将“Palace Beautiful”译为“华严宫”亦是如此，该词不仅传递了“美丽宫殿”的外在形象，还引入了佛教“华严”一词，使译文更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保留了原文的象征性意义。这些文化符号的置换和重构，不仅实现了文化意象的转化，更凸显了译者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精妙运用和文化意义的再创造。

在思想体系层面的转化上，郑晓沧通过对儒家核心要义的遵循与呼应，成功实现了原文西方教育思想的儒家化解读。例如在佩丝谱曲的歌词的末尾所强调的“天赐的福分”(bliss)，原文意在表达孩子们对天国的向往和神恩的赐予，而郑晓沧将其译为“志则苦矣，仁域永登”。郑晓沧巧妙地引入了儒家思想中“仁”这一核心要义，如此一来，原文本中的基督教信仰追求被转化为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修身成仁”之道，凸显儒家思想中追求“仁者”境界的教育目标。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凸显了儒家思想中的教育伦理和人文关怀，更增强了译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译者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以释道两家文化负载语汇为辅，突出儒家思想的主脉地位，使译文在思想层面上展现出更加丰富而深远的中国文化意蕴。

郑晓沧三个层面的创造性翻译受其文化身份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影响。作为译

者，他有意或无意地将自身的权力意志融入译本的生成过程，从而影响了译本所呈现的翻译风貌（Lefevere 1992a: 59）。郑晓沧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浸染于儒学氛围之中。他幼年进入私塾学习，还跟随父亲学习《论语》《孟子》《诗经》以及《读史论略》等儒家经典。因此，郑晓沧十分重视中国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应该把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这也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吴洪成、谈龙宝 1998: 96）。尤其是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郑晓沧坚决反对“中学校中，自修时间大部耗于英文，小学生之阅读材料充斥西洋材料”的现象，并指出，“三年级生有能西洋之跳舞而未知孔孟为何人者，社会心理，现已渐失民性独立之气概”（王承绪、赵端璞 1993: 23）。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郑晓沧将原作中的道德教育内容纳入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通过在译文中大量引用中国经典名著、运用儒家核心要义以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与隐喻，郑晓沧成功实现了基督教道德训诫的中国式转化，使译文坚守中国文化本位，更加契合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

再者，译者在翻译时还需考虑读者接受群体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Lefevere 1992b: 17）。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教育思想，并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房伟 2023: 7）。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实学，儒学逐渐淡出中心舞台，但其思想文化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伦理精神世界。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儒学教育也呈复兴之势。政府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加强了对传统文化宣传和研究，儒家思想得到空前重视（刘继青 2009: 40）。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持续汲取儒学的养分，例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出了对儒学困境的回应，他认为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代表了人类最近的将来的需要（陈来 2014: 43）。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其“知行合一”教育思想就是儒学思想融合西式教育思想的实践（方华明 2006: 112）。郑晓沧在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的同时，更强调中国教育应当做到“利用吾国固有之材料……使六经要义之简单者不至为学者所茫然不知”，他认为“六经要义”是“我国文化统一上之一种重要维系，犹不至于断绝”（王承绪、赵端璞 1993: 24）。由此看来，儒学思想文化在郑晓沧的教育理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小妇人》译文中传递的“谦卑”“勤奋”“谨慎”“求仁”等要素正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优秀价值体现。郑晓沧以中国儒家的伦理

道德范畴阐述西方基督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将原文的宗教教义转换为传统儒学内涵，使故事中蕴含的哲理更符合近代时期的教育环境，也更充分地发挥教育小说的道德训诫功能。

总之，郑晓沧在《小妇人》中实现了道德训诫的中国式转化，通过中西通融的契合点，将西方宗教教育思想杂糅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观念之中。西方教徒历经艰难险阻的“天路历程”被译者通过点铁成金的删改，纳入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等中国传统儒学道德体系，契合中国当时的教育环境和中国读者的接受心态，更好地实现了教育小说的道德训育功能。

#### 4 郑译《小妇人》与“新教育”原则

郑晓沧认为《小妇人》三部曲中的教育理念与新教育之原则多相吻合（郑晓沧 1936: 2）。作为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和践行者，同陶行知、张鹤琴等学者一样，郑晓沧主张向先进西方国家学习，倡导新教育，改革旧教育（郑刚、吴娅鑫 2023: 28）。其中，“新教育”运动以杜威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主张教育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解放，追求教育神圣和学术至上，争取教育机会均等，把教育当作推进社会进步的手段，认定教育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根基（汪楚雄 2006: 34）。

杜威提出的“儿童本位”原则是“新教育”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郑晓沧留学回国后肯定并大力宣扬杜威“儿童本位”的价值所在。他认为，“教育上自教材中心，转移到儿童中心，这是教育上的大革命”，“以儿童为中心，教育便是发展的，保守意义较少而进步的精神较多”（郑晓沧 1931: 54）。一方面，“儿童本位”的第一要义便是选择适合儿童的读物来教育儿童，彰显了儿童读物的重要性和需要。另一方面，“儿童本位”原则倡导在教育与成长过程中，重视儿童自身的需求和特性，促进其全面发展（同上）。

郑晓沧将“儿童本位”思想运用于文学作品中，具体体现在郑晓沧对小妇人浓墨重彩的描写，不厌其烦地刻画年轻人的性格外貌、欢笑畅谈。例如，梅格“实是一颗明珠；人道珠圆玉润，原是极可爱的”（郑晓沧 1932a: 285）；而原文仅仅是简单的“she is a dear”（Alcott 1868: 200）。介绍蜀雯时写道“其次是蜀雯，——人家却单把蜀字称她，因为雯字有女子气息，所以隐而不用”（郑晓沧 1932a: 9）。而原文为“Elizabeth, or Beth, as every one called her.”（Alcott 1868: 12）。郑晓沧在

《小妇人》翻译过程中有意着重笔墨刻画儿童形象，如对蜀雯介绍的增译处理，强化蜀的“假小子”特点，凸显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顽皮天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学演绎，使得“儿童本位”理论转化为形象的文学故事，使儿童独特的教育需求更突出。

其次，“新教育”原则强调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郑译《小妇人》生动地演绎了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式教学方法。郑晓沧认为中国“以前的人以为孩童不过具体而微的成人，是成人的缩影”，如此观念便造成了用成人的教育模式来教育儿童的做法（郑晓沧 1932b: 3）。小妇人们通过“天路历程”的游戏抒发内心所想（郑晓沧 1932a: 1-24）；与邻居劳笠出版刊物，发表诗歌作品（同上：203-222）。这正符合克伯屈所倡导的“设计教学法”——以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倡导儿童的自发创造性学习（易红郡 2013: 104）。“试验”一章中，母亲为女儿们准备的家庭实验给幼小的她们播下勤奋勇敢的种子，蜀最后终于醒悟：“荡荡儿是不值得的，我已经厌倦了，而且想马上有工作去做。”（同上：241）母亲带领女儿们在圣诞夜给邻居送礼，在这之后，小妇人们主动帮助抱恙的邻居，为此珮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上：365-380）。此类教育方法显然是杜威所认为的尝试经验带来的内化品质的外显结果。除此之外，家庭教育是传统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故事中马夫人认为“如其我要我的小女孩有一切美德，那末我自己须身体力行”（同上：164）。这毫无疑问传递了父母的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可以说，郑译《小妇人》为中国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朴实的生活中的成长故事，更是为千万家庭和学校提供生动且鲜活的新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案例。“故凡有事于教育者——教员、师范生及一般父母——从本书应可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郑晓沧 1936: 5），它不仅使得社会上的赌博现象无形减少，学校里的训育先生省去好些麻烦，还使中国大小家庭的“一股戾气”化成“一团和气”（傅任敢 1933: 957）。可以看出，同教育小说《爱弥尔》一样，郑译《小妇人》同样是演示家庭教育的绝佳范例。而家庭教育只是《小妇人》中的一部分，其关涉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内容同样发人深省。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新教育”运动下新式学堂所需要的与儿童生活相近的新式读物的要求，郑晓沧不仅有意着重笔墨刻画儿童形象，并且运用富有童趣的口语词汇，以加强小说的生活性。例如“囡囡儿”（doll）、“爬爬儿”（scrabble）、“荡荡儿”（lounging and larking）、“姆嬷”（marcies）等，将中国本土吴语方言融入故

事情节中，更贴近读者的日常生活。徐念慈指出当时小说“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徐念慈 1908：3）。而当时充斥小说市场的“教育小说”大多是揭露教育界黑暗与弊端的“教育问题小说”，其中蕴含着新与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显然不适合儿童阅读（马勤勤 2019：27）。此外，一批新理论家提出小说进课堂、通俗化以及创作读者感兴趣的作品等一系列可行性路径（李军辉、张慧 2023：132）。当时，《小妇人》被《小学教育指导书》编选入内（王云五 1935：62）。并且，“浙江学校中已有指定为课外读物者，京锡苏沪一带学生闻亦乐于讲诵”（佚名 1932：8）。教育部门专门颁发了 1880 号训令，把这本小说定为“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读物”，要“各小学尽先购备”（朱炯强 2006：284）。与当时揭露教育界黑暗与弊端的“教育问题小说”不同，郑译《小妇人》中凸显儿童天性，用词活泼亲切，笔笔生动，字字传神。这些生活化的青春细节正是这本教育小说鼓舞兴趣、启发智识、培养德行的魅力所在，堪称当时“精良之家庭读物”以及“模范家庭资料”（佚名 1932：8）。

总而言之，郑译《小妇人》充分体现了西方“新教育”原则的核心内涵，通过对儿童形象的深入刻画，郑晓沧成功将“儿童本位”理念融入文本。为满足新式学堂对贴近儿童生活的读物需求，译本通过通俗化处理，更加符合当时儿童受众的认知水平。再者，郑译《小妇人》生动诠释了不同于传统教育体系的现代教学方法，为众多家庭提供了基于新教育理念的实践范例。郑晓沧在接受并本土化西方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为新教育运动提供了具体而鲜明的理想模式，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为后续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 5 结语

郑晓沧自知当时中国家庭教育与儿童教育的不足，渴望通过西方教育小说寻找适合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思想的途径，因此带来了译作《小妇人》。它不是一部小说的简单移植，而是一次文化和教育思想的深度对话与融合。《小妇人》作为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舶来品”，和当时国内众多教育小说一样，彰显着巨大的感染力，其关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内涵在教育群体中激发了不少共鸣。

该书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在于郑晓沧精湛的翻译水平，更在于译本成功地将西方新教育思想与当时中国教育现实相结合，使其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并成

为近代教育文学的重要读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发挥影响。小说通过中西通融的契合点，在文本语言形式、文化意象与思想体系三个层面，将西方宗教教育思想杂糅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和观念之中，完成了道德训诫的中国式转化。其次，该译作是西方“新教育”原则的体现：通过对儿童形象的增益描写，郑晓沧将“儿童本位”原则融入到作品当中；为满足新式学堂所需与儿童生活相近的新式读物要求，郑译本实现了通俗化，更适合当时的受众群体；译本生动地演绎了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式教学方法，为千万家庭提供生动且鲜活的新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案例。通过接纳和本土化西方的教育理念，郑晓沧也为新教育运动提供了一种生动而具体的理想模式，在促进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为后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灵感。这种跨文化的教育理念传播和实践的尝试，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体现了教育小说的翻译可以为当时乃至未来的教育思潮提供动力和方向，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翻译本身。

中国教育小说研究对教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学术意义，文学作品与其他文献一样有着教育史学的价值。作为教育史资料之一，文学作品可以展现教育历史的细节，并反映教育史的一个侧面（杜成宪、邓明言 2019：246-249）。《小妇人》从 20 世纪 30 年代传入中国至今，其汉译本已多达四十余种。其中，民国时期郑译本《小妇人》虽已隐入历史深处，但其关涉的翻译、文学、教育以及思想图景却依旧鲜活生动，其间见证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进程的一段缩影，而这正是重读郑译《小妇人》的意义所在。

---

#### 注释：

- ①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Little Women* 的第一个汉译本为传教士贝厚德与助手沈骏英合译的《四姊妹》，由广学会于 1925 年出版，经五次再版，数量仅 5000 余本；第二个汉译本则是郑晓沧于 1932 年翻译的《小妇人》。之后的数十个汉译本皆沿用“小妇人”这个译名。
- ② 郑晓沧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期间师从杜威，并广泛吸收并践行杜威教育理念。回国之后，郑晓沧翻译了杜威的著作《杜威氏之教育主义》（又称《予之教育主张》）和《儿童与教材》；并且在杜威访华期间屡次担任口译员，演讲篇目包括《学校与社会》《教育行政之目的》《教育与实业》《小学教育之新趋势》等。郑晓沧

拥笃杜威思想并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同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人形成了中国杜威派学人群体，倡导经验主义教育，在中国教育领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 ③ 陈衡哲，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也是执教北大第一位女教授。1932年郑晓沧汉译《小妇人》中文译本首次出版后，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新书介绍。在文章中，她指出了当时国内教育救亡工作的现状，并探讨了该作品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 ④ 《天路历程》主要讲述基督徒经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获得灵魂拯救的故事。《小妇人》中，孩子们不断克服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虚荣、坏脾气、诱惑因素——受笞（Valley of Humiliation）、凶煞（Apollyon）、疑云（Vanity Fair）等，以及最终踏入的圣宁之地“天都”（Celestial City），这些意象皆出自《天路历程》。

#### 参考文献：

- 陈来. 2014. 百年来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42-46.
- 杜成宪，邓明言. 2004. 教育史学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方华明. 2006. 万世师表知行合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J]. 教育与职业（10）：110-113.
- 房伟. 2023. 先秦儒家的教育观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 2023-02-07.
- 傅任敢. 1933. 小妇人 [J]. 年华（2）：956-957.
- 衡哲. 1932. 小妇人（新书介绍）[J]. 独立评论（30）：20-22.
- 李军辉，张慧. 2023.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小说教育功能”普及的可行性探讨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30-135.
- 李浴洋. 2018. 从“教育小说”到“学术名著”——晚清民国时期《爱弥儿》中译本研究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50-58.
- 刘继青. 2009. 20世纪30年代儒学教育复兴的内因外缘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40-45.
- 刘阳河. 2024. 南武野蛮《新石头记》与清末中国“成长小说”的生成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4-24.
- 马勤勤. 2019. 知识迁移与本土再造——近代中国“教育小说”的发生与辨义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5）：17-33.

- 马新亚. 2023. 成长书写背后的个体辩证法——重读《在细雨中呼喊》[J]. 当代作家评论 (3): 58-66.
- 潘建民. 2005. 新发现胡先骕致郑晓沧书一通 [J]. 档案春秋 (9): 29+43.
- 沈庆会, 孔祥立. 2012. 西方教育小说的近代译介与接受 [J]. 小说评论 (6): 193-199.
- 孙枋. 1937. 介绍郑晓沧名译《小妇人》[J]. 濠上: 44-45.
- 田正平, 潘文鸯. 2017.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3): 121-131.
- 汪楚雄. 2006. “新教育运动”述论 (1912-1927)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 王弼. 2011. 老子道德经注 [M].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秀梅, 译注. 2015. 诗经 [M].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云五. 1935. 小学教育指导书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吴洪成, 谈龙宝. 1998. 郑晓沧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95-98.
- 吴宓. 1923. 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 [J]. 学衡 (15): 14-41.
- 心沭. 1935. 书报批评与介绍: 评《小妇人》: 美国奥尔珂脱著, 郑晓沧译 [J]. 妇女生活 (3): 135-139.
- 徐念慈. 1908. 余之小说观 [J]. 小说林 (10): 1-8.
- 杨天才, 张善文, 译注. 2011. 周易 [M]. 北京: 中华书局.
- 易红郡. 2013. “设计教学法”述评 [J]. 课程·教材·教法 (7): 103-109.
- 易乐湘. 2007. 在教育主义与儿童本位之间——《小妇人》新解 [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24-127.
- 佚名. 1932. 介绍郑晓沧译《小妇人》[J]. 上海市教育局教育周报 (174): 8.
- 尤美. 202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对比研究——以《小妇人》两个中译本为例 [D]. 长春: 吉林大学.
- 于胜蓝. 202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阈下《小妇人》两个汉译本中“乔”的角色重塑差异 [D]. 成都: 西华大学.
- 查良镛. 1946. 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 [A]// 张淑锵. 浙江大学史料: 第二卷 (1927—1949) [C].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6-27.
- 赵聪. 2019. “操控”与“反操控”: *Little Women* 汉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小妇人》和《四姊妹》为例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赵雪晴. 2021. 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小妇人》三个中译本对比研究 [D].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 郑刚, 吴娅鑫. 2023.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1): 27-36.
- 郑晓沧. 1931. 重申儿童本位的意义 [J]. 儿童教育 (9): 54-55.
- 郑晓沧. 1932a. 小妇人 [M]. 杭州: 浙江印刷公司.
- 郑晓沧. 1932b. 科学对儿童的赐予 [J]. 国立浙江大学季刊 (1): 2-3.
- 郑晓沧. 1936. 小男儿 [M]. 杭州: 浙江印刷公司.
- 郑晓沧. 1993. 郑晓沧教育论著选 [M]. 王承绪, 赵端瑛, 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朱炯强. 2006. 花间掠影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朱维之. 1941. 基督教与文学 [M]. 上海: 青年协会书局.
- 孜孜. 1936. 小妇人 [J]. 民智月报 (4): 29.
- ANTHONY K. S. 1939. Louisa May Alcott [M]. London: Cresset Press.
- CHENEY E. D. 1889. Louisa May Alcott: her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M]. London: St. Dunstan's House.
- LEFEVERE A. 1992a. A sourcebook: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 LEFEVERE A. 1992b.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Ltd.
- MURPHY A. B. 1990. The borders of ethical, erotic, and artistic possibilities in *Little Women* [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5): 562-585.

#### 作者简介:

金怡, 女,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史。

蒋硕, 男,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史、比较文学。